

俄罗斯文化与文学中的“安宁”观念

刘 崑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安宁”、“宁静”对于理解俄罗斯民族的生活方式、心理特征以及他们的东正教文化是一个重要概念,同时它深深植根于俄罗斯作家意识之中,并在大量的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论文从俄罗斯文化中“安宁”观念的宗教意义的起源和哲学内涵出发,以几部经典文学作品为例,系统论述了俄罗斯文学中通过这一观念所体现的宗教意义和文化价值。

关键词: 安宁;《圣经》;东正教;俄罗斯文化

中图分类号: I106.99

文献标识码: A

“安宁、宁静”(покой)在俄罗斯的文化中是一个富于宗教内涵和哲学意义的概念,它在历代俄罗斯文学的文本中都有所反映,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这一观念的内在涵义有所变异。要从俄罗斯文学的角度认识这一概念必然深入到整个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深层。司徒卢威曾在研究普希金的诗歌语言时指出,18世纪,“安宁”、“宁静”就成为普希金等诗人的作品中较常出现的词汇,并且在他的世界观和创作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В.Котельников 1994:3)同时,“安宁”也是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思想和语言发展的一个较为积极的因素。这一概念对于理解俄罗斯民族性和文学语言的宗教性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它无论在信仰本体论,还是在道德伦理领域都具有特殊内涵。而且,这种“安宁”观念在斯拉夫俄语书面语中被哲学家、神学家和语文学家经常提到,因此它也“是俄国文化中一个具有聚合意义的概念。”(В.Котельников 1994:4)

“安宁”首先古罗斯的《圣经》、祈祷词、教父学和使徒行传的翻译文本中有充分的显现,随之东正教民众又把这个词带到世俗用语当中,因此世俗文学中这一概念一直保持着它的宗教含义。(В.Котельников 1994:4)它的宗教本体论意义要追溯到《圣经·创世纪》,“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作已经完毕,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圣经·创世纪》第2章第2-3节)因此在上帝和人的第一约言——《旧约》中就确定了这种精神的宗教基础,宁静作为主的神圣安息日的象征而被神圣化,“这日你们要守为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圣经·利未记》第16章第31节)基督徒当守这个日子,因为这一日上帝所造的世界进入永恒。《旧约》的耶利米宣告:“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而《新约》则继续了这一启示,认为驯顺的宁静状态是与神合一的征兆。在永恒的宁静中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复活,对于最初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不容置疑的,甚至可以在神秘的静修中体验得到,而且这种复活的希望已经作为一种乐观的末日情绪充满了他们的精神和肉体生命。进入神的宁静王国就意味着人进入宗教的自由之中,宁静与自由一体的思想在俄罗斯的世界观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宗教形而上学的公理。在俄罗斯文化这种宁静

特征的深处，可以看到真正的自由，并在精神的自由中看到完美的、创造后的宁静。都主教费拉列特¹对此阐释道：“这种宁静并不是指事情做完了，而是指它的某个结果，宁静不是完全无事可做；因为完全无事可做是不可能的。而是指在和行为的外在客体相互作用之间相平衡的行为，劳动就是对于作用于行为客体力量的一种继续，就像上帝的劳动就是在尚未达到造物主的智慧和恩惠所要求的完美状态对造物的作用，但是在完成自己预定的目的之前，他的造物总是会尽可能地 and 神的完美相一致，这就是神性的宁静。”（В.Котельников 1994：4）生活在无限温顺的宁静中，就是上帝对人类的爱和关注的体现。如果说创世是造就物质世界的行为，那么宁静则是精神上的创造行为，由前者产生出多变的自然和历史，由后者产生向超自然的终极完美的内在运动。宁静是一种理想的精神存在状态，在其中世界和上帝交融在一起——这就是俄罗斯意识从《圣经》中所理解到的“安宁”思想。它在思维和艺术中的体现也是多样的。费奥多尔修士大司祭对此曾作出这样的神学和哲学论述：人根据自身的神人本性直接参与上帝创造的宁静，而且这种参与是双重的，一方面，永恒的生活的宁静会作为神恩的体现方式而庇护人，但人自身又应该因自己的精神创造事业而使自己在尘世能够参与神的宁静。（В.Котельников 1994：6）

18 世纪世俗文学中“宁静”一词的宗教本体意义还主要存在于教会文学中，是《圣经》中所称的意义，到了 18 世纪末以及 19 世纪，这一观念和主题已进入世俗文学，获得广泛的意义和风格特征，这与拜占庭的基督教神秘主义中的宁静主义思想对俄罗斯社会精神生活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之后这一概念的宗教哲学意义有所淡化，只在一些抒发内心感受的诗中出现，带有极其平常的感伤情调，这与 18 世纪俄国社会精神文化的大氛围有关，由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冲击和侵入，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占据了人们的心灵，宁静的宗教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被人性化色彩所掩盖。杰尔查文在自己的诗中赋予“宁静”一词以丰富多彩的生活意义和真正的艺术独立性。但是到了 19 世纪前半期，文学创作又体现出向宗教意义复归的倾向，它在另一个高度上回到了东正教世界观的价值体系。普希金首先远离了原有的书面文体诗歌的路子，常常从词的表层的边缘意义深入到它的核心意义（В.Котельников 1994:29），而“宁静”成为他揭示人内在生活本质的一种温和状态，重新成为一种教会传统中的形象—概念模式，但它在语义上不再是消极的，而是进入与诗歌的复杂内容之间鲜活的联系之中。“宁静”成为一种他从基督教中看到的乐观主义的象征，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便存在这种宁静的主题，并且在叙述中不断有所发展和加深。

这种宁静代表一种俄罗斯式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意义，仿佛是在对上帝的期待中完成的超越时间的存在，达吉雅娜的父母在乡村中所过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他们在平静的生活里
保持着亲爱的古代的风习；
他们在油腻的谢荤节
做俄国的馅饼；
一年他们斋戒两次；
……
就这样他们两个人到了老年。
并且最后，在丈夫面前
打开了坟墓的门，……
他是一个忠实良善的地主，
于是在那里，在他的尸灰埋葬的一方，
墓碑上说道：
“谦卑的罪人，德密特里·拉林，
主的奴隶和旅长，

在这块石碑之下永享安息。”（普希金 1996：67）

普希金对于乡村地主拉林家生活的描写和果戈理在《旧式地主》中所描写的两位地主老人的生活是极其相似的，可见俄罗斯的作家对于民族的这种古老生活传统和意义是有深切的认识的。在描写奥涅金的生活之前，诗体小说的抒情主人公表明了他本人和奥涅金的那种“俄罗斯的忧郁病”相对照的生活态度：

我生来爱好平静的生活，
爱好乡村的静寂：
在乡野里竖琴的声音更加响亮，
创作的幻想也更生动。
我在荒芜的湖边游荡，而无为就是我的法律。
我每天早晨醒来
为的是舒适的安稳和自由：
读得少，睡得长，不去追求飘浮的名利。
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我不是这样，
在无所事事里面，在阴暗里面，度过了我最幸福的日子。（普希金 1996：38）

作为对于奥涅金性格独特性和对于俄罗斯的另一种启蒙意义的衬托，普希金首先提出了这种俄罗斯传统生活和思想方式，以及人们在这种生活中得到的精神上的享受——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又是对于“奥勃洛摩夫式”的精神状态的一种写照。普希金意识到这种俄罗斯式的宁静，并使之得到艺术的表达。在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这种宁静的主题得到更多的体现，只是研究者很少去重视它。在现代的文学评论中常常提到的奥勃洛摩夫似乎只是一个无所事事的落魄地主、是封建农奴制体制下庸人的典型；无独有偶，果戈理的《旧式地主》几乎是重复了一样的题材和主题。如果说伟大的经典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对俄罗斯旧式地主的生活方式进行了讽刺和揭露，值得注意的另一个方面是，作为具有强烈的宗教意识和正教传统观念的作家，在描写这种现实的时候，不可能不去思考这种生活状态的精神意义；同样，对于一贯被认为“在信仰问题上极其传统”，而“不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富于宗教探索精神”（В.Мельник.1995：203）的冈察洛夫则代表了最为本色和原始的俄罗斯宗教文化心理，因此屠格涅夫说：“纵然到了只剩下一个俄罗斯人的时候，他都会记得奥勃洛摩夫的”；而对于《旧式地主》，一些研究者给它的定位也是从精神内涵方面着眼的，例如叶萨乌洛夫对于果戈理的《密尔戈罗德》给予这样的分期：“旧式地主”生活在“黄金时代”，因为他们不是生活在与社会的和谐之中，而是生活在与自然的和谐之下；而在《塔拉斯·布尔巴》中则为“白银时代”所取代，主人公有了敌人和暴力死亡；“青铜时代”体现在《维》中，主人公在内心主观世界中看到自己的敌人；而《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则标志着“黑铁时代”的到来。所有这些提法和评论都不会是没根据的。诚然，冈察洛夫和果戈理在对寂静死板、毫无生气的旧式地主的生活的描写带有一些讽刺意味，以至于“奥勃洛摩夫性格”已成为俄罗斯文学和文化批评中一个具有特指意义的词语。但是他们在作品中对人物精神价值的评价显而易见，俯拾皆是。这种精神追求正是掩藏在被作者当作首要的自然状态来描写的奥勃洛摩夫气质之下，因此这种无所用心的懒散生活节奏并没有降低它的宗教意义和精神价值，而是使宗教的主题在更高的层次上有所提升，并获得绝对真理的神恩和福祉。在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中除去作家的艺术探索，还有俄罗斯风俗文化和传统观念的体现，即把宁静视为世界存在的最高状态，这种状态可以对抗和消融现世的风暴和欲望，对此作者曾感叹道：“在这柔和的、驯顺的温暖中，生命是多么安宁啊！”这种如同天空和大海的宁静不是死亡的宁静，而是精神得到满足后的安宁。

奥勃洛摩夫终日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地看着太阳东升西落，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他的思想是关于人和人类的，但是他从不想付诸行动，把别人无谓的忙碌视为一种不幸，就连女

人和爱情他都认为是一种麻烦。但是奥勃洛摩夫却有一颗金子般可贵和善良的心，因此奥尔加爱他并想把他从这种瞌睡状态中拉出来，结果她失败了，她没有嫁给奥勃洛摩夫，而是嫁给了他的朋友希托尔兹，并且她发现自己几乎要变得和奥勃洛摩夫一样，他在她心目中的纯洁和完美仍是不可替代的：

“他身上有比一切智慧更宝贵的东西：一颗诚实、真挚的心！这是他天生的黄金；他洁白无瑕地保持了它一生。他因为推撞而跌倒，变得毫无生气，终于感到幻灭，失去了生活的力量而熟睡不醒，可是没有失却他的诚实和真挚。他的心并未发出过一个假的音符，并未沾染过脏污。任何漂亮的谎话都诱惑不了他，任何东西都不能引导他走到虚伪的道路上去；尽管一片汪洋的脏污和邪恶在他的周围汹涌，尽管全世界都中了毒，闹得天翻地覆——奥勃洛摩夫决不会向虚伪的偶像膜拜，他的灵魂永远纯洁、光明、诚实……这是一个水晶似的透明的灵魂：这样的人并不多；是稀有的；这是人中之宝！他的心你无从收买；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指靠它。这就是你始终信任他，而我决不以替他操心为苦的原因。我认识许多有高贵品质的人，可是从未遇见过一颗更纯洁、更光明和更单纯的心；我爱过许多人，可是都没有像奥勃洛摩夫这样持久而热烈。既然认识到了，就无法不再爱他。”（冈察洛夫 1963：585）

这类过着俄罗斯式的宁静生活的人们身上的善良品质是作家们怀着复杂的感情予以关注的东西。当一个前来拜访的朋友说自己又发表了一篇怀着粗野的嘲笑和憎恶去描写一个窃贼或妓女的文章时，奥勃洛摩夫从平静的安睡中愤怒了，

“你描写一个窃贼、一个娼妇、一个傲慢的笨伯都可以，可是你别忘了他们是人。究竟人性在哪里？您是单凭头脑写作吗！”奥勃洛摩夫差不多丝丝作声了。“您以为思想是用不到感情的吗？不，思想是爱所孕育的。伸出一只手去扶起堕落的人来，或者为他痛哭，假使他正在毁灭的话，可是别嘲弄他们！爱他，在他身上想到您自己，并且对待他像对待您自己一般——那时候我才读您的作品，并且在您的面前低头……”（冈察洛夫 1963：31）

果戈理在旧式地主心向上帝之国的宁静生活中也看到了俄罗斯人性格中善良的特征：“在那些老头儿和老太太的脸上，你见到的总是那样善良、那样关切和虔诚的神情，你会不由自主地抛弃，哪怕是暂时地抛弃一切想入非非的念头，不知不觉地全身心地沉浸于下层的这牧歌般生活之中。”（果戈理 1999：4）

他们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拥有财产的罪恶感，他们从不多贪占一点财产，而是乐于和所有的人在一起，奥勃洛摩夫和旧式地主两位老人家里常年不断地吃着东西的客人们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与俄罗斯东正教中视财产为罪恶的传统观念是直接相关的：“而那肥沃的土地仍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那么多的东西，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和普利赫里娅·伊万诺维奇所需的又是如此之少，因此所有这些骇人听闻的窃掠在他们的家产管理中似乎全无踪迹。”（果戈理 1999：15）他们过这种生活纯粹是习惯力量使然，而不是个人的刻意追求。老奥勃洛摩夫就是这样生活的，他并不确切知道自己的收入和支出，也从不编制预算，他说：“父辈和祖辈并不比我们傻，他们一辈子都过得很幸福；我们也会活下去的，上帝会让我们吃饱的。”（冈察洛夫 1963：524）他从不使任何阴谋诡计，只要从领地上拿到的收入够每天同一家子和各种各样的客人尽量吃喝，他便感谢上帝，认为努力多挣钱是罪过。

这种生活方式是奥勃洛摩夫卡人精神上一个无比美好的梦，就像奥勃洛摩夫的梦一样：这个地方没有高山，没有大海，没有绝壁，没有深潭，没有密林——人们一年四季，随着节令不动声色的循环，过着生老病死、祈祷祭祀的一成不变的平静生活，“一颗兴奋得疲惫了的或者不知道兴奋的心，都愿意到这与世相忘的一角里来藏身，生活在谁也不了解的幸福之中。这里，一切都向人保证平静的、长寿的生活，直到一个人头发变黄，然后像睡眠一样地死去。”一些根本的、必然的事件充实着人们的生活，给人们无限的慰藉；人们会平静地接受生命和死亡，认为那是上帝旨意——这是上帝所祝福的一角，寂静和安宁主宰着人们的风

习，自然也不会发生抢劫、杀人或任何可怕的事件，人们没有强烈的欲望去进行大胆的冒险事业。在这个梦里奥勃洛摩夫才是一个7岁的小孩子，他用纯真而明敏的眼光观察着人们怎样消遣这份静谧的生活。他们如同生活在闭塞空间里的古代的原始人类一样，会发现天空出现异兆，并相信各种神奇的现象和传说……

奥勃洛摩夫“是这种宁静与富足的充分而自然的反映与表现。他审察着和深思着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安于这种生活，……再无什么东西要追求……他的生活理想可已经实现。”（冈察洛夫 1963：592）而生活在这种“庄严的宁静”中的被造世界的生活就像一条河一样静静地流淌。“不管怎么说，这时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激情与这种持久的、缓慢的、几乎是无感觉的习惯的力量相比则是十分幼稚的。”（果戈理 1999：35）奥勃洛摩夫所生活的那种天堂式的宁静是与人物内心精神上的完整性相一致的。作为一种上帝的造物而存在，冈察洛夫有两个出色的比喻，他把奥勃洛摩夫比作柏拉图和修道院里的长老，在尘世的生活中就已向着永恒的安宁迈进。到了1830年以后，在俄罗斯浪漫派文学中出现歌颂这种“宁静”的主题，这也是和俄罗斯文学中另一种人格气质——精神的狂躁和分裂，在信仰和非信仰之间徘徊的灵魂相对立的，这两种文学人物的人格气质一方面是作者主观精神探索的体现，另一方面也从正反两个角度阐明了宗教信仰对于俄罗斯灵魂的重要意义，说明了俄罗斯文化特征和民族性格气质与东正教文化的密切关系。

在基督教传统中，安宁被视为造物主完美以及神圣性的固有性质，而动荡则是不完美的表现，远离宁静的完美必然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疯狂状态。旧式地主老夫妻静悄悄的生活象征了天堂中静美自由状态的理想，他们远离外界的纷扰，不追求外在的“地上的财宝”，时刻愿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别人。维系这两个老人存在的精神纽带是爱，这是一种善良无私的、光辉而纯洁的感情，形成两个旧式地主精神生活的全部，只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些，因为这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习惯，然而或许正是在这种习惯中，可以找到可与外界种种欲望相对抗的精神力量。就像圣者金口约翰在教义中所讲的：“没有比心灵中存在的欲望更能引起我们痛苦的东西了，因为一切不幸都是从外面发生作用，而欲望是从内心产生；由此将产生巨大的折磨。即使整个世界都令我们难过，但只要我们自己不去折磨自己，那么对于我们就没有什么承受不了的。”（В.Котельников 1994：43）两位老人每日向上帝祈祷的习惯已成为他们稳定的生活内容，这是认识上帝的一种方式，包含着巨大的精神价值，这是带着一定的目的偶尔或偶然而为之的人所无法比拟的。杜纳耶夫认为，这种天国幻景一般的生活的迅速结束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即老太婆没有生育子女，这在东正教观念中是有罪的女人；《圣经》中说：“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圣经·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5节）老太婆没能在生产上得救，意味着她的罪过无法从上帝那里得到救赎。（М.Дунаев 1996：104）

这种宁静而沉闷的古老生活方式在俄罗斯现实生活中的力量是异常强大的，一些俄罗斯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倒不一定把它当作一种民族性格的劣根性进行批判，但已感到它对于俄罗斯人存在状态的影响之大，即使是到了社会主义苏联时期，在俄罗斯的一些小城仍保持着这种自18世纪以来的停滞不前、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甚至在革命者内部一些人身上也保留着这样的陈旧观念和习俗，皮利尼亚克在《红木》中就对这种生活状态作了生动的描写和深刻的讽刺，例如旧城人们日常生活的缓慢节奏和毫无生气；工程师阿基姆的两个姑姑的生活状态以及两个像乞乞科夫一样的古董商的来访都是对俄国生活和传统文化再一次讽刺性展示。皮利尼亚克不是把这种宁静视为人类地上生活的一个美妙和梦境，而是揭开了在这种生活状态背后潜在的道德堕落和生活的苦涩。“他们醉意朦胧，专注于干酪和大葱头，他们在亚细亚的俄罗斯帝国的平静中过日子。而葱头状的教堂尖顶便是这俄罗斯生活的象征。”（皮利尼亚克 2002：3）由此可见，对于古老的俄罗斯文明，皮利尼亚克怀着深深的复杂感情，在社会大变革的动荡时期，作者把对古老生活和信仰的复现当作对抗蔑视个体生

命的新生政权的内在精神力量。

但是毕竟时代使人对生活的宗教意义进行着不断的重新思考,一些观念的价值在人们的思维中也发生着变化,尤其是苏联时期的一些作家在社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会作出各种不同的反映,对人类的生存问题会进行更为深刻的思考。在米·布尔加科夫那里,安宁的观念已从东正教文化内部的意义上升到道德哲学的高度,和人类的良心联系在一起。作品《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安宁作为一个与道德相关的主题贯穿全篇,并借助宗教末世论的隐喻意义获得更加深刻的哲学内涵。

从处死耶稣的彼拉多良心的呻吟:“月圆之夜我不得安宁……”到小说结尾耶稣对大师和玛格丽特归宿的宣判:“他不应该得到光明,他应该得到安宁”都是对安宁的道德意义的确认。耶稣所属的光明世界是一种远离造物世界的幻境,是这个“三倍浪漫的大师”所创作的神话人物耶稣和利未·马太所在的世界。而大师作为一个内心惊恐不安的尘世的人,安宁的感觉是他所能够熟悉并渴望的,他需要得到的正是在灵魂的宁静中体验与上帝的交融,在创造后的安宁中进入精神的永恒,在小说所叙述的事件结束的最后一天,即这些尘世的生命最终作一了结和宣判的时候,恰好是星期六,这正是布尔加科夫想借用宗教仪式中伟大的安息日的寓意来实现人类进入永恒的愿望的一种方式。这时作者已达到古希腊时代对于艺术本质的认识,即认为艺术家是神的特殊容器,诗人的灵感来自上帝,而人类离开上帝的启示奢谈创造则是狂妄、渎神的,艺术家的创造就是上帝精神的流出,因此创作者大师所得到的安宁的结局也是基督教意义的深化。大师能够预感到这种永恒的安宁正是死亡一刻的不断延续,是足以和喧嚣尘世的欲望、邪恶、死亡相对抗的通往彼岸生活的道路,它超越了生命和死亡的界限,从而达到人对于神性的复归。

大师和玛格丽特死后所安身的乐园虽不是天堂,却有着天堂般的安宁和美妙,和被宽恕后的彼拉多一样,这种安宁更多是精神意义上的,它对于一个良心的囚徒(彼拉多)或被现实世界之恶所逼迫的不安的心灵(大师)来说都是无比珍贵的,彼拉多在超现实时空的世界中终于被他的创作者大师放走了,和耶稣踏上了月光之路的阶梯,他似乎已经相信以前的行刑纯粹是个误会,他根本没有犯过那种罪过;同样作者借助超现实的创作手段,让大师和玛格丽特直接进入创作之后的田园般的安宁境界,他们

“一起朝他们永久的寓所走去。大师仿佛觉得玛格丽特的低声细语就像身后潺潺流淌的溪水。大师的记忆,惊惶不安,伤痕累累的记忆,渐渐熄灭了。不知谁放开了大师,他自由了,就像刚才他自己放走了他创造的主人公。这个主人公去了无边的云天,一去不返。他就是星期日凌晨获得宽恕的占星王的儿子,残酷的第五任犹太总督,骑士本丢·彼拉多。”(米·布尔加科夫 1998: 480)

东正教世界观并不认为天堂的安宁和尘世的安宁之间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一些作家通过词语和民族情感体验到“安宁”的宗教意义,并且完全对安息日一样的安宁和俄罗斯式的宁静作出特有的理解,以至于后来作家创作中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这一概念。他们几乎从不同角度证明了俄罗斯意识中这种根深蒂固的对上帝创世后的安宁状态的向往。作品中大师是一个被创造的人,对这个被创造的人的命运和灵魂的关注是作品的主旨,就像在果戈理对艺术创作的理解中所包含的安宁思想一样,“对人来说关于神的天国的暗示存在在于艺术之中,因为这一点它就是超越一切的。庄严的宁静无限高于一切尘世的躁动;创造无限高于破坏;天使因其灵魂纯净而光明的童贞无限高于一切其他力量和撒旦的欲望;艺术的创作高于世间的一切……艺术家就是在惊恐不安中感受得到安宁。”(В.Котельников 1994:40)因此《大师和玛格丽特》中也不乏前辈经典作家和俄罗斯传统宗教伦理观念的影响,是对安宁观念的一种新和阐释和继承。

附注

1 费拉列特 (1782—1867), 俄国宗教人士, 莫斯科都主教。

参考文献

- [1] Котельников. В. А. 1994 «Покой» в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их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контекстах [J]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
- [2] Дунаев. М. М. 1996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часть 1 [M], М.
- [3] Мельник. В. И. 1995 О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и И. А. Гончарова [J]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
- [4] 圣经 1996 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 南京。
- [5] 果戈理 1999 密尔戈罗德,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 [6] 冈察洛夫 1963 奥勃洛摩夫,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7] М. 布尔加科夫 1998 大师和玛格丽特, 北京: 作家出版社。
- [8] 普希金 1996 叶甫盖尼·奥涅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 [9] 皮利尼亚克 2002 不灭的月亮的故事,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On the Concept of “Peace” in Russia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LIU Ku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eace”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Russian culture of the Orthodox Church, Russian ways of life and the feature of its mentality. The concept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Russian writers and is vastly embodied in their literary works. Beginning with the original religious meaning of the word and illustrating with some classic works, the author of this thesis systematically analyses and discusses the essence of the concept of “peace”, and points out what its cultural worth is.

Key words: peace; Bible; Orthodox Church; Russian culture

收稿日期: 2004-05-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2000ZDXM740012)

作者简介: 刘锬 (1971—), 女, 黑龙江双城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博士, 主要研究俄罗斯文学。

[责任编辑: 刘 锬]